

中国考古集

苏秉琦题



东北卷
辽 (三)



东亚文库

中国考古集

苏秉琦题

东北卷 辽(三)



北京出版社

K87-53
2012/16

《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

主 编 孙进己 冯永谦 苏天钧

常务副主编 孙 海

副 主 编 黄凤岐 张志立 孙 泓

编 者

综 述(一)

张志立 孙 海 张春霞

综 述(二)

张志立 孙 海 张敬军

旧石器时代

张志立 杨新平 张 岩

新石器时代(一)

孙 海 蔺新建 清格勒

新石器时代(二)

孙 海 李晓钟 石 箴

青铜时代(一)

孙 海 张志立 申国俭

青铜时代(二)

孙 海 张志立 蔺新建

青铜时代(三)

孙 海 张志立 李晓钟

秦汉至三国(一)

孙 泓 张春霞

秦汉至三国(二)

孙 泓 张春霞

两晋至隋唐(一)

孙 泓 张春霞

两晋至隋唐(二)

孙进己 孙 泓 张春霞

两晋至隋唐(三)

孙进己 孙 泓 张春霞

辽(一)

冯永谦 孙 海

辽(二)

冯永谦 孙 海

辽(三)

孙 海 张国庆

金(一)

黄凤岐 孙 海 李志遥

金(二)

黄凤岐 孙 海 张玉虹

元明清(一)

苏天钧 孙 海

元明清(二)

苏天钧 孙 海

《东亚文库》编委会

主 编 孙进己
副 主 编 黄凤岐 冯永谦 干志耿 苏天钧
李昌仁 朝 鲁 刘永智 穆鸿利
常务副主编 冯永谦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干志耿 于国华 王 雷 王宏刚 王革生 王绵厚 卢明辉 冯永谦
冯季昌 孙 泓 孙 海 孙进己 孙秀仁 齐 心 朱国忱 刘永智
苏天钧 刘国有 吴文衡 李之勤 李昌仁 李国英 李英魁 李逸友
李殿福 张志立 张泰湘 高书全 崔 灿 孟广耀 周伟洲 郑绍宗
徐德源 黄凤岐 朝 鲁 秦洪祥 蒋秀松 魏国忠 魏福祥 穆鸿利
编辑部主任 孙 海
编 辑 孙 泓 张志立 张玉虹 张 岩

《中国考古集成》编委会

名誉主编 苏秉琦
顾问 佟柱臣 张忠培 朱子方 干志耿 王建群 孙守道 李逸友
主 编 孙进己 冯永谦 苏天钧
常务副主编 孙 海
副 主 编 黄凤岐 张志立 孙 泓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侠 王丽萍 王绵厚 马延平 尹学伟 方起东 石 箴 冯永谦
许明纲 孙 泓 孙 海 孙长庆 孙进己 孙秀仁 米文平 曲守成
朱国忱 刘俊勇 刘素侠 刘景文 任晓光 苏天钧 李宇峰 李英魁
李晓钟 李殿福 张 英 张 岩 张 鹏 张志立 张春霞 张柏忠
张泰湘 严长录 何贤武 吴喜才 杨新平 邵清隆 柳 岚 段新澍
姚义田 黄凤岐 盖山林 常春林 清格勒 崔 璇 崔福来 崔德文
塔 拉 蔺新建 魏存诚

目 录

辽宁地区三十年来辽代考古收获	冯永谦(1547)
辽宁地区辽代建置考述	冯永谦(1552)
辽宁地区纪年辽墓研究	李宇峰(1571)
辽宁地区未纪年辽墓及相关问题*	李宇峰(1577)
辽宁地区辽代古塔分布与研究*	李宇峰(1580)
辽塔峻嶒耸碧穹——辽宁地区古塔巡礼	曹 汛(1586)
辽宁辽代砖塔的砖雕艺术	包恩梨(1588)
一幅珍贵的契丹地理图——苏州藏《地理图》碑考略	姜念思(1594)
辽宁近年出土、征集的宋辽金官印选辑	武家昌(1598)
白釉铁锈花鸡形“鸡冠壶”辨	李红军(1600)
鸡冠壶与鸡腿坛	添 萌(1604)
开原、喀左新发现的两方辽金铜印	马云鸿(1605)
辽宁省建平、新民的三座辽墓	冯永谦(1606)
辽宁建平县两处辽墓清理简报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620)
双龙鎏金银宝冠	公孙燕(1626)
辽文忠王府金银器小考	濡 川(1627)
辽榆州城建置年代考	李国学 冯文学(1630)
辽代安德州今地考	金殿士(1631)
辽宁朝阳姑营子辽耿氏墓发掘报告	朝阳地区博物馆(1633)
辽耿氏墓志考略	朱子方 徐 基(1653)
辽代耿氏三墓志考释	朱子方(1659)
读《辽代耿氏三墓志考释》	罗继祖(1671)
对《辽代耿氏三墓志考释》的一点补充——兼答罗继祖同志	朱子方(1673)
辽代耶律延宁墓发掘简报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1675)
《辽耶律延宁墓志铭》考释	嵇训杰(1680)
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	靳枫毅(1682)
辽宁朝阳辽赵氏族墓	邓宝学 孙国平 李宇峰(1691)
辽宁朝阳市辽刘承嗣族墓	王成生(1697)
朝阳辽常遵化墓*——兼谈一级文物珍品——围棋子	刘桂馨(1707)
朝阳县木头城子辽代壁画墓	张克举 孙国平(1709)
辽宁朝阳孙家湾辽墓	孙国平 杜守昌 张丽丹(1710)
辽宁朝阳县发现辽代张让墓志	李宇峰(1714)
辽《韩瑞墓志》考	田立坤 张 晶(1715)

《全辽文》韩瑜、韩椅墓志校记六则及《附跋》商榷	李锡厚(1718)
朝阳北塔	于 余(1721)
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地宫清理简报	朝阳北塔考古勘察队(1722)
朝阳三塔考	张洪波 林象贤(1740)
朝阳云接寺塔	于 余(1742)
朝阳市北塔辽代文物	(1743)
云接寺塔	王晶辰(1744)
朝阳北塔 1986—1989 年考古勘察纪要	朝阳市北塔考古勘察队 朝阳市北塔维修办公室(1745)
朝阳县南双庙辽金元代摩崖石刻	华玉冰 万 欣(1752)
朝阳南双庙辽代石刻崖画调查清理简报	华玉冰 万 欣(1753)
龙城发现辽代奇形窑址	栾晓东(1757)
后晋天福元宝小议	杜 军(1757)
铜鱼符的由来与契丹文铜鱼符	徐英章(1758)
双龙鎏金银宝冠	公孙燕(1760)
北票扣卜营子辽墓发掘简报	辽宁朝阳地区文物组(1761)
北票柳条沟辽墓	冯永谦(1764)
发掘北票莲花山辽耶律仁先族墓的收获	冯永谦 韩宝兴(1768)
辽宁北票莲花山辽墓壁画的揭取	李宏伟(1770)
北票出土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铭》考释	阎万章(1774)
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考释	韩宝兴(1783)
巧夺天工	孙守道(1802)
北票泉巨涌辽墓发掘简报	张洪波 李 智(1803)
白川州与川州初释	白广瑞(1806)
北票县大乌兰区莲花山村古墓情况	(1808)
辽宁北票水泉一号辽墓发掘简报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1809)
辽宁喀左县辽王悦墓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1816)
辽宁喀左县兴隆沟辽墓	喀左县博物馆(1820)
喀左北岭辽墓	武家昌(1822)
萧仅墓志铭校勘	刘凤翥(1835)
彰武县后房身发现窖藏铜钱	胡 健 李丽新(1836)
辽宁彰武县西南城子城址调查	李宇峰 孙 杰(1840)
辽代头下军州“西南城址”调查记*	孙 杰(1845)
锦州千年古塔——大广济寺塔	玉 令(1849)
广济寺	王晶辰(1850)
锦州大广济寺	陈 白(1852)
辽宁锦州市张扛村辽墓发掘报告	刘 谦(1853)
锦州辽墓出土人骨分析	刘 谦(1863)
锦县建业发现窖藏铜钱	刘兴东(1864)
辽西省义县清河门附近辽墓的发掘简报	阎文儒(1865)
义县清河门辽墓发掘报告	李文信(1868)
辽西省义县清河门西山村“辽佐移离毕萧相公”族墓发掘工作报告	李文信(1898)
辽代梁援墓志考	薛景平 冯永谦(1901)
义县四道岔子辽梁援墓	薛景平 宝 兴(1909)
辽代梁援墓志补说	胡顺利(1911)
义县出土契丹文墓志铭考释	厉鼎燧(1913)

奉国寺	邵福玉(1918)
奉国寺	王晶辰(1920)
奉国寺	沈 滨(1922)
义县奉国寺无量殿实测图说	曹 汛(1923)
义县奉国寺调查报告	(1927)
义县奉国寺大雄殿调查报告	杜仙洲(1928)
义县广胜寺塔及其建造年代	曹 汛(1939)
辽“嵩德宫铜铎”及其有关的一些问题	林荣贵(1942)
辽宁清河门辽萧氏墓地发现的水井	金德宣(1944)
龙岗辽代墓志考释	姜念思 韩宝兴(1945)
契丹小字《耶律宗教墓志铭》考释	阎万章(1948)
北镇辽耶律宗教墓	鲁宝林 辛 发 吴 鹏(1952)
辽宁北镇县发现辽代铜犁范	刘 鲋(1957)
北镇闾山三处础石遗迹	徐伟光(1958)
北镇县龙岗辽墓	张克举(1959)
北镇崇兴寺双塔	于 余(1960)
崇兴寺双塔的结构及建筑风格	郑景胜(1961)
崇兴寺双塔	王晶辰(1962)
辽隰州来州城考	刘 谦(1963)
锦西大卧铺辽金时代画像石墓	雁 羽(1965)
锦西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志研究	阎万章(1970)
辽宁锦西西孤山出土的辽墓墓志	刘 谦(1979)
锦西西孤山辽萧孝忠墓清理简报	雁 羽(1980)
兴城县白塔峪塔	刘 谦(1982)
跋兴城塔子沟出土的两件石刻	朱子方(1983)
辽严州兴城考*	刘 谦(1985)
辽宁建昌龟山一号辽墓	靳枫毅 徐 基(1989)
喀左县博物馆收藏的古代铜官印*	刘新民(1995)
辽宁喀左县出土辽代鸡冠壶	喀左县博物馆(1999)
辽王氏二方墓志考	向 南(2000)
凌源近年出土的几件陶瓷器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	刘 莉(2004)
凌源温家屯发现的辽代契丹人墓葬	冯永谦 韩宝兴(2009)
凌源温家屯辽墓发掘简报	韩宝兴(2011)
建平西窑村辽墓	李庆发(2016)
三彩刻花鸡冠壶	巨桂兰(2019)
建平张家营子等地契丹贵族墓	(2020)
阜新地区辽城考记	孙 杰 高庆升(2021)
阜新地区的辽代古城址	李宇峰(2026)
辽代檀州、顺州考	冯永谦(2029)
辽代成州考	阎万章(2035)
辽晋国夫人墓志考	冯永谦(2041)
辽宁阜新辽萧仅墓	李宇峰 袁海波(2044)
阜新县发现辽代萧仅墓志铭	赵振生(2048)
萧仅墓志铭刍议	陈志健(2050)
《萧仅墓志铭》中的萧撒剌其人及其后裔	唐统天 刘淑珍(2053)

萧仅墓志铭新考	魏奎阁(2056)
辽宁阜新县大固本辽墓发掘简报	李宇峰(2058)
阜新县海力板村辽墓	李学峰(2060)
阜新海力板辽墓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阜新市文化局文物组 阜新县文物管理所(2061)
阜新发掘一座早期辽墓	李宇峰(2072)
以海力板辽墓发现为中心概述契丹族在阜新地区的活动	李宇峰(2073)
阜新南皂力营子一号辽墓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阜新市文物组(2077)
辽宁阜新县辽许王墓清理简报	阜新市文化局文物组(2083)
阜新发现的辽瓷板耳壶	李宇峰(2086)
耶律弘益萧氏墓志铭新探	魏奎阁(2087)
阜新辽代文物述略	李品清(2089)
辽宁阜新市契丹辽墓清理简报*	阜新市博物馆(2093)
释录阜新出土辽代文物两则	赵振生(2096)
阜新发现契丹小字墓志	吕振奎(2097)
《吕舟大师铭文》补释*	吕振奎(2098)
《吕舟大师行记》浅说	张九成(2101)
阜新县红帽子乡辽塔地宫清理记	赵振生(2103)
辽《白山院舍利石匣记》考	李宇峰 李品清(2105)
辽宁阜新海棠山发现契丹小字造像碑	吕振奎 袁海波(2108)
阜新县岫云寺初考	刘宪国(2110)
阜新辽代佛教文化初考	李品清(2112)
论辽代阜新佛塔的兴建*	刘国有(2115)
辽懿州城宝严寺塔记	刘 谦 刘 鲋(2118)
关于古懿州城址的讨论(两篇)	(2121)
关于辽代懿州城的讨论	(2124)
辽代安德州今地考	金殿士(2127)
辽欢州塔记	刘 谦 刘 鲋(2129)
辽宁阜新丁寺出土鎏金铜像	吕振奎(2131)
彰武五家子辽墓清理简报	孙 杰 刘俊玉(2133)
彰武小南洼辽代城址调查记	孙 杰(2134)
沈阳崇寿寺白塔的文物	李彩翥(2136)
沈阳延寿寺塔及其出土文物考略	丁 军(2139)
沈阳塔湾舍利塔	林茂雨 刘 伟(2145)
沈阳塔湾无垢净光舍利塔塔宫清理报告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 沈阳市文物考古工作队(2146)
辽代无垢净光舍利塔地宫四天王壁画初探	王菊耳(2160)
从沈阳塔湾舍利塔石函铭文看辽代沈州的居民	朱子方(2166)
无垢净光舍利塔的重大发现	孙庆永(2171)
辽沈州卓望山无垢净光塔石棺铭	章万岩(2173)
沈阳地区辽代城址调查——兼考辽代沈州灵源县址	冯永谦(2175)
辽滨塔抢救清理获重要发现	沈阳市考古队(2179)
辽双州遗址遗物考*	李仲元(2180)
沈阳石经幢考	王明琦(2185)
新乐遗址发现辽代墓葬	唐裕菊(2189)
新发现的“天赞通宝”钱	武玉辉(2189)
沈阳柳条湖辽代石棺墓	王菊耳(2190)

法库叶茂台古墓群*	温丽和(2191)
法库发现辽代早期墓葬	魏春光(2194)
辽宁法库县叶茂台辽萧义墓	温丽和(2195)
辽北府宰相萧义墓志跋	罗继祖(2200)
补辽萧袍鲁墓出土的契丹大字墓志铭	冯永谦(2201)
辽宁法库前山辽萧袍鲁墓	冯永谦(2203)
法库叶茂台辽墓记略	辽宁省博物馆 辽宁铁岭地区文物组发掘小组(2212)
法库叶茂台十九号辽墓发掘简报	马洪路 孟庆忠(2221)
叶茂台辽墓出土古画的时代及其他	杨仁恺(2224)
叶茂台辽墓古画有关问题的再认识	杨仁恺(2227)
叶茂台辽墓出土的陶瓷器	冯永谦(2233)
古墓遗丹青	公孙燕(2241)
叶茂台辽墓中的棺床小帐	曹 汛(2242)
辽宁省法库叶茂台出土契丹民族铜丝网罩	温丽和(2252)
双陆棋	申淑琴(2253)
“双陆”杂考——从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的双陆棋谈起	梁淑琴(2254)
浅谈双天鹿缠枝花纹绣	杨景秀(2258)
叶茂台辽墓与辽朝后族萧氏*	温丽和(2260)
辽宁康平县后刘东屯二号辽墓	铁岭市文物办公室 康平县文物管理所(2262)
康平海洲辽墓清理简报	武家昌(2267)
辽宁康平县后刘东屯辽墓	康平县文化馆文物组(2269)
辽宁康平发现的契丹、辽墓概述	张少青(2272)
昌图八面城出土一枚契丹文铜印	裴耀军(2277)
抚顺市光明街辽墓发掘简报	抚顺市博物馆(2278)
辽宁清原县二道沟出土定窑系统瓷器	王运至(2281)
开原崇寿寺塔	于 余(2283)
开原崇寿寺塔建于辽代考	姜念思(2284)
辽宁省昌图县发现辽代子母铜狮	李矛利(2286)
辽阳三道壕辽墓	李庆发(2287)
辽阳隆昌两座辽金墓	李庆发(2289)
辽阳发现辽墓和金墓*	辽阳市文物管理所(2292)
辽宁辽阳县金厂辽画像石墓	王增新(2294)
辽阳白塔创建年代质疑	金殿士(2297)
白塔	(2299)
辽阳白塔	玉 玺(2300)
江官屯窑址	(2301)
辽宁鞍山市汪家峪辽画像石墓	鞍山市文化局 辽宁省博物馆(2302)
辽宁鞍山市羊耳峪辽代画像石墓发掘简报	张喜荣(2307)
鞍山地区北宋钱窖藏考略	刘德忠(2310)
辽代“官墙子”鹤野县址考	刘景玉(2312)
辽代铁州故址新探	崔德文(2315)
试论土城子村古城址*	崔德文(2317)
试论辽金时期在我地区的曷苏馆址*	董万军(2318)
海城金塔	祝明也(2320)
海城银塔的建造年代	曹 汛(2321)

辽契丹大字铜印谁识	李宇峰(2323)
辽宁盘山县发现辽契丹大字铜印	李宇峰(2324)
海城地震区寺塔调查记	曹 汛(2325)
岫岩镇阜昌门辽金遗址试掘简报*	杨永芳 卜长义(2334)
岫岩新甸乡发现辽代壁画墓	王玉芳(2337)
岫岩新甸北门口辽代壁画墓清理简报*	王玉芳(2338)
永丰塔小议	于临祥(2340)
丹东市区辽代、契丹族的遗存	王连春(2341)
辽“镇东海口长城”初探	张清濂(2343)
金县哈斯罕关址	(2345)
东沟县新立西土城遗址调查简报*	王传璞 祝延学 李华东(2346)
后记	(2349)

辽宁地区三十年来辽代考古收获

冯永谦

辽宁地区的文物考古工作,于1949年6月就在沈阳、阜新等地开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由于大规模的工农业基本建设破土动工,文物出土机会更多,因此在1954年成立了东北文物工作队,专职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对于辽代的考古,三十多年来,调查和发掘了许多遗址、城址和墓葬,积累了大量的文物资料,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果。下面,仅就辽宁地区的辽代考古发现,作一概要说明。

一、辽代墓葬

辽代考古发现最突出的是墓葬。现经约略统计,在清理发掘的墓葬中,仅是出有纪年铭刻文字的墓,就达三十余座,出土其它遗物更为丰富。

就现在所知,辽代早期的墓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已发掘最早的墓也为穆宗应历时期的。

辽宁地区早期的墓葬,当数1975年以来在朝阳县西涝村发掘的刘承嗣家族墓了。六座墓中出有刘承嗣、刘宇杰、刘日泳祖孙三代人的墓志;志中记载刘承嗣死葬于景宗保宁二年(公元970年),这是除北京赵德钧墓、赤峰大营子辽驸马墓之外,最早的一座墓了。刘承嗣为刘守奇子、五代燕王刘仁恭之孙。刘守奇因愤于其兄刘守光杀兄囚父,于太祖元年投辽;后又叛辽归晋王,而刘承嗣却因此留于辽地,其后子孙繁衍,多人在辽、金两朝为官。参以其它出土资料,对于了解五代时期以及刘仁恭的族系,都是很宝贵的材料。现存于喀左县文物保管所的乾亨三年(公元981年)王裕墓志,是葬于“建州柏山之先莹”家族墓地的墓葬,并已出土了其孙王奉诸的墓志,同样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材料。此外,还有五十年代清理发掘的建平县张家营子乡和朱碌科乡两座辽墓,出

土大批珍贵文物,如不同窑场烧制的瓷器、金银器、玛瑙和琥珀等;不同质料制成的装饰品,以及由鞍一簪、衔镡、当卢、镫等组成的马具和铁制日常生活用具,充分反映出契丹民族生活习俗。特别是朱碌科墓中出土的大量水银,这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用以处理尸体防腐的第一次发现的考古实例。

辽代中期,即圣宗及其以后的墓,朝阳柏树沟耶律延宁墓是一个重要发现。耶律延宁,《辽史》无传,墓志记他为“羽厥里节度使”,“威极北之疆境……荡灭顽凶,路不失遗”,统和三年死于职守。根据文献材料,羽厥里部活动范围在胪朐河(今克鲁伦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由此可清楚看出辽代对黑龙江上游一带有效行使实际管辖权的情况。喀左县钱杖子村发现统和二十三年(公元1005年)王悦墓,墓志载“葬于利州西三十里尖山南”,尖山,今称“双尖山”,恰在今喀左县城大城子镇西三十里,从而可以推知今大城子镇东部的古城址即为辽之利州,这是最为明确的证据。同时根据墓志,可以纠正《辽史》之误,《地理志》说:利州为统和二十六年置,而王悦死于统和二十三年,已说“葬于利州西”,可见利州建置是较早的,《武经总要·北蕃地理》说“利州,承天太后所建”,承天后在圣宗统和初年听政,其说州为那时所建是全完可能的。在十八亩村发现统和二十五年奉殷墓志,其中记载了俘虏和买卖奴婢的真实记录,这对于了解在圣宗时期契丹社会逐渐完成封建化的同时,奴隶制的残余依然大量存在,这篇志文是一件极好的材料。朝阳纺织厂统和二十六年常遵化墓,出土的青瓷雕花狮嘴注壶,造型新颖,雕塑精美,是一件较为少见的作品,墓中出土的围棋子,白子全部为玛瑙制成,玛瑙在辽代社会是很被重视的,应该说这样的围棋当时是很名贵的。姑营子耿延毅家族墓的发掘,出土三合墓志,分别为圣宗统和、开泰和太平年间的,耿延毅墓志记其祖耿崇美在五代后唐末归辽,

并曾参与伐石晋的战争,耿延毅也曾与北宋交兵;耿延毅妻耶律氏,实即韩知古的后裔,韩氏被赐姓耶律,志中记韩知古与韩匡嗣等人一族世系甚详。这些墓志对了解辽代中前期的一些历史事实有价值。属于这一时期较为重要的墓,还有法库县叶茂台村七号(绢轴画)墓和朝阳县前窗户村墓与北票县水泉村一号墓等。叶茂台村七号墓保存非常完整,发掘前根本未遭到任何破坏,是非常难得的。这座墓由甬道、主室和两耳室构成。出有木制棺床小帐、填彩雕四神与卷草火焰纹的大石棺和不同窑场的精美陶瓷、玛瑙、玻璃、铜、漆器以及木桌、椅和成套的马具等。特别是出土一套完整的双陆棋,十分罕见,它是我国目前仅有的一具双陆棋实物。在墓中出土的大量冠服饰品也是非常难得的,刻丝海水、怪兽、金龙被,是仅有的发现。而在棺床小帐两山墙板上悬挂的《山水楼阁图》与《竹雀双兔图》轴画,前此未见,也是第一次出土的绘画作品,为我国古代绘画断代与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标本。朝阳前窗户墓和北票水泉1号墓所出遗物非常相似,它们的时代应相去不远。这两座墓出土的一大批陶瓷器,时间特点比较明显,颇具特色,像鸡腿坛、凤首瓶、鸡冠壶、注壶等,都是断代的极好资料。水泉墓中出土的青瓷飞鱼形水盂,瓷胎细白坚致,青釉明澈润泽,造型极见工巧,展翅欲飞,实是很少有的发现。前窗户墓出土双凤纹鎏金银冠,也很重要;据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这种银冠已有四种:建平张家营子辽墓双龙纹鎏金银冠、锦西西孤山萧孝忠墓斜方格网状纹鎏金银冠、平泉小吉沟出土龙凤云纹鎏金银冠。这些银冠的纹饰总是以龙凤火焰为题材,说明它们可能与宗教有关。兴宗时期的墓葬,最为重要的是阜新清河门萧相公族墓,是始葬于重熙十三年(公元1044年)的墓群。发掘的结果,获得大批陶瓷,并出土了汉文墓志与契丹小字墓志,都是很重要的发现。根据墓志残石,此处墓地即重熙年间两次出使高丽的萧慎微祖墓群,年代翔实,对了解辽代中晚期的墓葬制度是很好的材料。

辽代晚期,即道宗至天祚时的墓葬,发现的就比较多了。1972年朝阳地区博物馆清理了牟杖子清宁六年(公元1060年)赵匡禹墓,出土雕四神石棺、残经幢和白瓷雕花注壶等,据墓志赵匡禹为赵思温之孙,志文篇幅较长,颇资参考,所出瓷器对于辽瓷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在北镇县龙岗子村发现圣宗弟、秦晋国王隆庆之子耶律宗政和耶律宗允的墓,是分别葬于清宁八年(公元1062年)、咸雍元年(公元1065年)和咸雍五年(公元1069年)。在耶律宗允的墓志上载有“以咸雍元年四月十一日,备卤薄鼓吹,

陪葬于乾陵,祔孝贞皇太弟之茔”的话,由此可见,耶律宗政等人为乾陵的陪葬墓;同时在龙岗子村北的山谷中发现许多建筑基址和具有辽代特点的砖与绿琉璃瓦等大量建筑材料。这些发现,对于寻找因金兵毁坏而湮灭的辽显陵和乾陵,都是极为宝贵的线索;根据调查材料推测,这一带即应当是陵域,这为进一步确定陵寝位置创造了条件。北票县莲花山村在五十年代后期发现了一个辽代重要人物:尚父、于越、宋国王耶律仁先的墓。墓为圆形,出有铜器、瓷器等。最重要的是在墓中发现有契丹文和汉文墓志,汉文墓志盖上刻有“大辽国尚父于越宋国王墓志铭”等字,志文叙其世系与职官甚详,可补《辽史》记载之不足。耶律仁先葬于道宗咸雍八年,是辽代后期的一座重要墓葬。五十年代初发现的锦西县西孤山村萧孝忠墓,出土有汉文和契丹大字的墓志,对于契丹字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材料。法库县前山村萧袍鲁墓,葬于大安六年(公元1096年),墓中出有瓷器等遗物,并有长篇铭文的墓志,还发现马、牛骨和一具完整的狗骨,这充分反映出契丹民族的游牧生活习俗。法库县叶茂台村天庆二年(公元1112年)萧义墓,是辽代晚期的一座重要墓葬。萧义,《辽史》有传,作“常哥”,是天祚赞鲁德妃之父。志文较长,达1700余字,叙事远较史传为详,尤其是补证后族萧氏世系上,更为珍贵。墓中壁画保存也很完整,通10余米长的墓道两壁作画:《出行图》与《归来图》,包括多组内容,驼车仪仗,气势宏伟,近墓门所绘人物高达3米,掌握皆有分寸,反映出辽代画师的艺术才能。

在辽宁地区,即辽之东京(今辽阳)和中京的兴中府(今朝阳)一带还流行一种画象石墓,这是辽代晚期一种具有地区特点的墓葬形式。过去在辽阳、鞍山地区曾发现过不少画象石墓,但大部分都被破坏了;近年又续有发现。这种墓一般都为八角形,角端立石柱,柱两侧有凹槽,嵌入石板,内壁作半浮雕画,石面较为粗糙,如鞍山汪家峪、锦西大卧铺等地的墓,墓中出有陶、瓷器和铜钱等。除八角形墓室外,辽阳金厂村画像石墓为长方形的,内中并出土一具棺,较为特殊。雕刻内容有墓主人的宴饮和出行的场面,但绝大多数画面为孝子义妇等表现封建道德观念的孝悌题材,从中可以看出此时契丹人社会意识已经和汉人完全相同了。

辽自圣宗以后,佛教空前盛行,随着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佛教这个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普遍泛滥起来,因之死后采用火化骨殖的葬式,也跟着出现。在1949年6月,发掘了沈阳市小西边门开泰四年(公元1015年)的李进墓。墓为砖筑,圆形,用木棺形的

石棺盛骨灰,棺身刻“沈州李进”等铭文,棺外雕四神,棺内出有陶瓶、陶罐、砖熨斗、残石俑和铜钱等多种遗物。此墓为有纪年的火葬墓中最早的一座。锦西西孤山萧孝忠墓也是骨灰葬。1955年发掘的辽阳市大林子村寿昌二年(公元1096年)王翦妻高氏墓亦为火葬,石棺盖内面并直接刻梵文《警觉陀罗尼》经,更可看出受佛教思想支配的痕迹。

二、辽代佛塔

辽代社会由于佛教流行的结果,除了大建寺院外,今天还遗留下来相当多的砖塔。这些高层建筑,经历了千年风雨的剥蚀,有许多仍保存很好,但也有残坏不堪,最后倒毁了。因此,三十多年来,还清理发掘了一些塔基地宫,获得许多珍贵的出土资料,这对于鉴定塔的年代有了科学依据。兴城白塔峪塔,保存较好,而地宫被当地群众挖穿,后经调查清理,地宫内发现辽“大安八年”造塔记和诸杂陀罗尼造塔功德经等大量石刻与其他一些遗物,这不仅提供了有关塔基地宫的建筑情况,还保存下来当时佛教与辽代最高统治者的密切关系的材料。沈阳市小北城门外白塔,因残坏倾斜,在1956年拆除。塔身为八角十一级密檐式实心砖塔,地宫为圆形。塔身拆下有佛名砖、文字砖、砖兽、瓦当、铁刹针、铜宝珠和石佛等;地宫内出有石函、小木塔、银塔、铁盒、铜盒、银盒、白瓷瓶、玻璃瓶、铜钱和舍利子等。石函盖上刻有“维乾统七年岁次丁亥四月”等铭文,记载了建塔的年代。乾统七年,为公元1107年,是辽天祚帝的年号,此时距辽亡仅有十八年了,为辽代晚期的遗物。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辽塔,方形多级密檐式实心塔不多,只有朝阳的南塔、北塔、凤凰山云接寺塔、五十家子塔等有数的几座外,绝大部分为八角形多级密檐式实心塔。这种塔,和唐代可以登临的方形空心塔与宋代楼阁式塔不同,这是一种改进。就建筑上来说,它优于前两种形式的塔,表现为有较强的抗震能力。1975年冬,营口、海城发生7.3级强烈地震,许多现代建筑如钢筋房屋、坚固烟筒等都遭到严重破坏,而位于震中的海城金塔、银塔和稍远的辽阳白塔等,却未受到毁坏。可以看出这种多角实心的建筑,能承受较强的地震。

此外,经过近年的调查,对某些塔的建置年代也有所订正。过去认为有的塔为金代的,其实是辽塔。兴城白塔峪塔经过清理,发现“大安八年”造塔记及

刻经,确知为辽代所建,把历来认定为金塔的说法纠正过来。辽阳白塔过去被定为金代遗构,更是不易翻的铁案。因为有《金史》记载,历史相沿,普遍认为辽阳白塔是金世宗为其母贞懿皇后李氏所造。但是,如果认真考虑,即从文献上的其它记载与该塔本身特点来看,都不可能是金代遗物。1981年,辽阳市进行文物普查时,于另地发现了贞懿皇后的塔铭,从而可知李氏墓塔已毁,应在他处。这就为鉴定辽阳白塔确系辽代所建,提供了出土的考古依据。

三、辽代陶瓷

辽代以一个游牧民族的身份,在我国北方建立起新的王朝,它对发展和繁荣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作出了伟大贡献。“辽代陶瓷”就是契丹民族为我国陶瓷发展史增添的光彩和实际内容。

辽代陶瓷窑址很多,在辽宁地区已发现的就有数处。江官屯窑,在辽阳城东25公里、太子河南岸的江官屯一带,窑场范围极大,窑室分部多处,堆积也厚。此窑场始烧于辽,直到元时方渐衰而后弃。所烧器物胎质一般稍粗,瓷化程度不高。器形有杯、碗、盘、碟、罐等日用器和犬、马、人物与猪头形口笛等小玩具。烧造的器物以白釉为主,也有黑釉的,挂釉多不到底。一般素器较多,花纹主要是雕划花与白地黑花,不见印花器。此窑的一个最大特点是烧窑时不用匣钵,而是用各式耐火砖障火,由于所烧器物在窑室中裸露,直接接触焰火,因而瓷面光洁度不高,这是其它窑场很少见到的窑艺技法。

烧制砖瓦陶器的窑址,发现的就比较多了也比较丰富。1954年,我们在辽阳市鹅房村发掘了两座瓦窑址,马蹄式圆窑,有火膛、窑床、烟道和烟囱组成。1973年,笔者协助铁岭地区举办考古训练班时,在法库县叶茂台村西山清理一座辽代瓦窑址,亦为圆形窑;又在该县北土城子村古城址南墙外发现砖窑址等,都是研究辽代窑业的很好材料。

根据目前研究进展情况看,今后在进行野外考古工作时,对古窑址的调查,应充分加以注意。

四、辽代城址

《辽史·地理志》说:辽“总京五,府六,州、军、城

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今天,在辽宁地区遗留下来的辽代城址,为数不少,这些城址有的在辽亡后被弃置,有的为金、元所沿用,但最后有的发展为今天的城市,而也有一些湮灭无闻了。辽宁地区经过调查的城址,有百余座,这为我们了解辽代城址结构与建筑规模等,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它极大地丰富了文献记载之不足。

昌图县马仲河村古城址,1964年因修筑公路施工,从地下挖出两缸铜钱,重360公斤,引起文物考古工作者的重视;经现场调查,发现这里原是一座古城址。结合文献记载进行考察,证实该城即是建成于辽重熙九年(公元1041年)的肃州城。辽代祺州的确切位置与城址规模、结构等,过去由于没有去过现地,直到近年也未搞清楚。1973年以来,经笔者前后几次实地调查和勘测,才有了明确认识。城址位于康平县东南部郝官屯乡小塔子村东、辽河西岸。城距河仅百米。城址长方形,周长1200米,墙存高4米,外有马面,四角有角台,在东、南、西三壁中间有门,门外有瓮城。城外环以护城河,清晰可见为两道河身,两河之间存有土脊。西门外路北侧,有八角十三级密檐式实心砖塔一座,亦为辽代遗物。朝阳五十家子安德州城址,经近年调查,为土筑长方形城,周长1700米,墙存高1米余,有南、北二门。城内出有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石幢,城外西北角亦有一座方形十三级密檐式实心砖塔。其他还有很多城址,都是很重要的,对辽代历史地理的研究是非常难得的材料。

五、辽代重要出土文物

地下出土的辽代遗物,丰富多彩,许多都是过去所未见到。有的本身是艺术品,有的是研究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物,有的是研究辽代社会政治状况的极好材料,有的却可说明契丹民族的习俗,有的体现了民族间的关系等。因此说,这些考古发现,都是非常宝贵的。

辽代绘画,保存到今天的已经很少了。过去出土的材料仅知辽永庆陵绘有壁画,如四季山水和彩绘图案,但那也是凤毛麟角,十分罕见。近三十年以来,在发掘的辽墓中出有大量壁画,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这是前所不能比拟的。建平张家营子辽墓、法库叶茂台绢轴画(7号)墓、萧义墓、朝阳姑营子耿延毅墓、辽阳石嘴子壁画墓、法库叶茂台八角石室墓等,都出有不同形式的壁画。其中以萧义墓壁画最为完

整,总长达30余米,包括许多内容,真实地再现了契丹贵族的生活。叶茂台7号墓出土的两幅绢轴画,不仅是辽墓中第一次发现的绘画实物,成为可靠的断代标本,而且更难得的是保存下来五代至北宋这一时期轴画的装裱形式。同墓中棺床小帐直棂窗背板上画的墨线行猎图,二人三马,张弓臂鹰在浅草平铺的原野上,追逐野兽。这幅辽地风物的写生画稿,充分反映出契丹人的日常生活情景,十分难得。在辽代雕刻艺术中,以石棺雕刻最见功力。朝阳柏树沟耶律延宁墓雕四神大石棺、沈阳小西边门外李进墓雕四神石棺、建昌耿杖子契丹文石棺以及画像石墓等,是绘画与雕刻的结合体;尤其是法库叶茂台7号墓出土的填彩平雕大石棺,更具有代表性,这具石棺,四壁雕四神,绕以火焰状云形纹,棺盖雕牡丹和人物化了的十二生肖像与盘绕如枝叶状的火焰纹,填色绘彩,富丽堂皇,为过去所仅见。特别是石棺前挡(前和)里面也有雕刻:门吏、伎乐、朱雀、飞天等,本是废弃不拟采用的画稿,虽尚未全部雕刻完,所见一部分是绘画,一部分是雕刻,因而它为我们保留着绘画与雕刻的关系和过程,这也是很难得的。

反映辽代生产发展状况的遗物,也有许多重要发现。经过调查,在朝阳、阜新和铁岭地区,出有各种农业生产工具,镰刀、铁锄所占比重很大,长柄锄铁钩和锄板分制,与近代铁锄基本相同,其中昌图八面城辽韩州和阜新红帽子辽成州等古城址内,出土的大批铜、铁铎范,铸造规整,套合精确,说明辽代的冶炼铸造技术很高。同时由于农业生产工具的大量出土,也反映了辽代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

辽代的手工业更趋发达。法库叶茂台14号墓出土一大批铁制的容器、兵器、生活用具和手工工具。其中以手工工具最为出色,如铁凿就有宽刃、窄刃、圆刃、斜刃等多种型号,充分反映出辽代木工制品的精细要求。

金属工艺表现了更高的技术水平。建平张家营子辽墓出土的双凤纹鎏金银鞍桥、双龙火焰纹鎏金银冠和朝阳前窗户辽墓出土的双凤火焰纹鎏金银冠、法库叶茂台7号(绢轴画)墓出土五塔镂花嵌珠鸾凤纹银捍腰等等,都是难得的发现,在细密精巧的地纹上,锤鍐主纹,并再使之突出,这种多层次的表現技法达到了主纹立体效果,也说明了当时金工锤鍐技术的高超。建平张家营子墓出土的错金铁剪、法库叶茂台14号墓出土错银缠枝花鸟纹铁罐,制作精细,也同样表现辽代错金银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

丝织品的大宗发现,当首推法库叶茂台7号(绢轴画)墓。死者身著长袍、短袄、裙、裤、套裤等10多

件衣裳,头戴冠帻,脚着软靴,手戴绣花手套,腰挂绣花香囊,尸体贴身用绸缠裹,最上边覆盖刻丝衾被等。丝织物包括绢、纱、罗、绫、锦和刻丝等七类九十多个品种规格,织造精细,尤其那件海水、怪兽、金龙刻丝衾被,难度很大,并且用金入丝,这是首次发现五代至辽、宋时期丝织品用金的标本,过去没有见到这方面的实物,从这次发现可以看出辽代丝织工艺的高度成就和发展水平。

辽代陶瓷,是具有地方色彩和民族特点的一种器物,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一定位置。近三十年来,经过调查、发掘的墓葬和遗址,获得了一大批出土的辽代陶瓷资料,许多都是少见的精品。朝阳西涝刘承嗣族墓、建平张家营子墓、朱碌科墓、朝阳柏树沟耶律延宁墓、前窗户墓、北票水泉1号墓、扣卜营子墓、法库叶茂台7号(绢轴画)墓、阜新清河门萧慎微祖墓、新民巴图营子墓等,所出土的陶瓷尤为珍贵。它不仅为辽瓷研究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如辽代白釉铁锈花瓷器出现的时间、“官”和“新官”字款瓷器的窑场归属、辽代有无官窑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标本,而且为辽瓷的断代分期、发展演变和制作工艺等的研究,以至进一步做出辽代陶瓷的编年来,这都提供了地下出土的可靠资料。

我国棋类产生的历史悠久,但实物保存下来的很少,尤其是古代棋具更属罕见。在近三十年来所发掘的辽墓中,曾多次出土棋类实物。围棋发现较多,锦西西孤山萧孝忠墓出土的围棋,有陶制棋子76个,黑白二色,圆饼形,模印花纹。朝阳纺织厂常遵化墓,出土围棋子,白色棋子为玛瑙制成。关于双陆,过去没有见到实物。法库叶茂台7号(绢轴画)墓所出土的木制双陆,盘板长方形,一套棋具完整无缺,这应是目前国内现存最早的双陆实物了。1980年,笔者在建昌县进行文物普查时,在城子沟的一座辽墓中,发现1件用扁平石块刻制的棋具,两面各刻一棋,并刻有类似契丹大字的文字4个。这种棋向无记载,不知何名,亦不知如何奕法。后来我们向当地群众了解,居然有很多人对其中的一种棋会奕,称之为“老虎吃绵羊”;而对另一面之棋局,则竟一无所知了。这块石棋盘的发现,可知这种棋至今当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只不过它的流传可能仅在农村山野中(现在我国北方农村还普遍流行有“五道”、“九连”和

“斃死牛”等,就很相近这种“老虎吃绵羊”棋),未曾登“大雅”之堂,因此过去未见任何记录或著入棋谱,也就是它失传和不为人所知的原因了。

近三十年来,在辽宁地区所发掘的辽墓中,还发现一大批契丹字的资料。属于大字的资料,首先是1950年在锦西西孤山发现萧孝忠墓志1合,一石刻汉字,一石刻契丹文。其后朝阳县柏树沟耶律延宁墓,出土墓志,上半部刻契丹字,下半部刻汉文,但由于不是对译,故此契丹字不能通读。其他大字资料较为零星,如建昌耿杖子契丹铭文石棺,建平张家营子墓出土银碟和朱碌科墓出土银匙上划字,以及盖县什字街、凤城县凤凰山、建昌县白塔子出土的铜印,也都是很重要的。属于契丹小字的资料,阜新清河门萧相公族墓出土有残志石。最为完整的是阜新县白台沟辽墓出土的许王墓志,志盖中有6字契丹文与汉文对译,是非常难得的。近年来对契丹文的研究进展迅速,在大小字的鉴别、识字与读音等方面,都取得一定成果;这些材料的发现,有助于探索和进而彻底解决契丹字的识读问题。

在发掘的辽墓中,还较普遍地出现一些反映契丹族的特有葬俗。阜新清河门萧慎微祖墓出土铜丝手足络套,新民巴图营子墓出土鎏金铜面具和胸牌,就是这种葬俗的实例。近年在法库叶茂台发掘的第18号墓,出土了一件笼络包括头、尸体和四肢全部在内的铜丝网套,这是前所不知的新发现。他如建平朱碌科墓用水银处理尸体防腐,古代北方其他民族也曾用过,不过考古发现至今也仅此一例。此外,还发现一些与契丹原始宗教萨满教有关系的遗物,而新民巴图营子墓出土的铜胸牌,上镌长篇《智炬如来必破地狱真言》,显然是和佛教密宗相结合的产物了。至于像法库叶茂台7号墓以绸带裹尸、手握珠、鼻有塞、覆面和尸衾等,则是明显的汉俗,从而也可以看出此时的契丹人——至少是墓主——已经汉化得很深了。

总之,三十多年来辽宁地区的辽代考古收获是很大的,看到这些发现,令人鼓舞;可以预期,随着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和研究的深入,必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东北考古研究(一)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辽宁地区辽代建置考述

冯永谦

辽在公元10世纪初建国,辽宁地区是其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普遍建置州县,为后来金代的建置创造了条件,也为辽宁地区进一步开发打下了基础,直到现在辽宁省的许多城市,就是从辽代建置上发展起来的。因此,辽代建置沿革的研究,是研究历史地理的重要课题。

辽宁在阿保机建国前已为其所有。《辽史·太祖本纪》载:太祖在其未建元称帝前的公元908年就曾“筑长城于镇东海口”,909年又“幸辽东”,915年“钩鱼于鸭绿江”。阿保机称帝后,于神册四年(公元919年)“修辽阳故城,……改为东平郡,置防御使”,这是辽王朝在辽宁地区最早的行政建置。及至天赞五年(公元926年)阿保机攻灭渤海,占领忽汗城(今黑龙江省宁安县渤海镇古城址),以其长子耶律倍主之,称为东丹国。天显三年(公元928年)将东丹国南迁于东平,即今辽阳,令“东丹国民居之,升为南京”^①。其州县建置在辽代五京中,不仅数量最多,而且在分布上也是最普遍的。

辽代设五京,今辽宁地区为辽东京、中京和上京三道的辖地。东京道的范围,由今义县中部以东包括医巫闾山在内向东北沿新民县北境、法库和康平县的东境、开原与昌图县的西境一线以东,皆为东京道辖地;中京道的范围,由今建平、朝阳县的北部起往南,经义县西境到锦县一线以西,皆为中京道的辖地;上京道的范围,在辽宁地区主要是头下州,其地有今阜新、彰武、法库、康平等县。本文就今天行政区划的辽宁境内的辽代建置,依《辽史·地理志》顺序分别略作考述。

一、东京道

据《辽史·地理志》载:东京道共“辖州府军城八

十七”^②。由于东京道地域辽阔,这些州城分布除辽宁外,远达吉林和黑龙江两省。下面仅考建于今辽宁境内的州县。

1. 东京辽阳府

东京辽阳府,它是在战国秦、汉以来辽东郡襄平城旧基上建起来的。今天在辽阳市北郊三道壕村发掘的西汉瓮棺墓群,有的陶锅上划有“昌平”二字,是王莽改襄平后的名称;韩夹河发掘的晋代壁画墓,于石壁上发现划有“太康九年”与“襄平”等字,证明今辽阳市即古襄平城。辽代在襄平旧址上建东京辽阳府,但是由于对历史的误解,辽人认为秦、汉时期的辽东郡所辖的辽阳县就在这里,因而建置就以“辽阳”命名,实际燕、秦、汉时期辽东郡的辽阳县,是在此之北的辽河北岸,即现在辽中县茨榆坨乡偏堡子古城址。《辽史·太祖本纪》神册四年(公元919年)所说的“修辽阳故城”,其实是修襄平故城。辽人不察,误彼为此,遂致此后千余年来将古襄平城易地改为辽阳,而置辽阳故城于荒烟蔓草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今辽阳旧城周围多处发现辽代墓葬,1955年在辽阳市北郊大林子村发现的辽寿昌二年王翦妻高氏石棺墓,棺上有铭,首题王翦为“大辽国东京府内省判官文林郎”等字,其妻寿昌二年死后葬于府城之外,足证辽东京辽阳府即为今辽阳旧城。

辽阳府下辖九县:辽阳、仙乡、鹤野、析木、紫蒙、兴辽、肃慎、归仁、顺化。

在此应该说明的是:各县之下所叙该县历史沿革完全错误,无一可信。如辽阳县,下注云:“本渤海国金德县地,汉水县,高丽改为勾丽县,渤海为常乐县”。实际这些建置根本不在辽阳,不仅相距遥远,而且沿革亦误。其他各县情况也是如此,考辽史地理者不能不注意及此。甚至对辽阳府的记述也有这种问题,如认为辽阳府城即“平壤城,辽东京本此”,并且还是渤海国“忽汗州即故平壤城也,号中京显德府”^③。这种错误在诸史中是罕见的,而在《辽史》中

则比比皆是。尤其是与渤海州县关系,错误更为明显。本来是辽灭渤海后,将渤海州县人民迁来辽地建城居住,或用新名或用渤海原来州县名称,结果修史时就认为渤海原设州县在此,写入《辽史》,成为辽代建置沿革,混淆了根本不在一地的前后两代的建置,给考史者带来很大困难。今天,根据考古发现可以得出结论,渤海南界在辽宁中部地区是在开原、新宾一线^④。因此,在辽宁中南部地区很难找到渤海所建州县。辽志载东京辽阳府辖九县,由于未记方位与里距,一时还难以全部解决。

辽阳县 所述沿革皆误,实为战国燕、秦、汉辽东郡之襄平。因是首县,乃东京辽阳府治,与府同城,为今辽阳市旧城。

仙乡县 注谓:“本汉辽队县”。按《明一统志》卷二十五说:“辽队废县,在海州卫西六十里,……辽改曰仙乡”。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三十七海州卫条:辽队城“辽曰仙乡县,属辽阳府,金废”。近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篇》考证:“辽仙乡县即汉辽队县,今地在辽宁省海城县小河口西北高坨子附近”。此亦不确,因其地既无汉城址,也无辽城址,故不取其说。笔者以为仙乡县,按其地望与近年考古调查发现,应为今海城市西境四方台村古城址。

鹤野县 注谓:“本汉居就县地”。明毕恭《辽东志》卷一《地理志》古迹门称:“鹤野废县,辽阳城西八十里,汉为居就县地”。金毓黻等《奉天通志》卷五十四指出:“《明一统志》,鹤野废县在都司城西八十里,不知何据。若为汉居就县故地,则应在今辽阳南”。该书其后定点又与此不同,可不论。近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篇》则定“辽鹤野县故址在今辽阳市西南85里之唐马寨古城”。笔者以为此定点亦误。在五十年代我们在辽阳地区考古发掘时,在辽阳市东南90里亮甲村发现一座汉代古城址,西傍汤河,城内有厚达4米的文化层,经考证为汉居就县;又经近年调查,在城址上层出有大量辽代遗物,兽面纹瓦当、各种白瓷器片、陶瓦片等,明显为辽代城址。笔者以为今辽阳县河栏乡亮甲村古城址即为辽阳府所辖鹤野县。并且也符合“汉居就县地”的条件。

析木县 其所述沿革亦误。但析木县址至今仍存,为今海城市东南40里析木城乡驻地析木城村古城址。析木县后升为铜州,仍治析木县;既已划出,并又置州,实即不应再列入辽阳府所辖之县中。

紫蒙县 其沿革亦误。因无与府之方位、里距,确址有待今后进一步考古发现。

兴辽县 注谓“本汉平郭县地”。平郭为今盖县县城,恐失之过南。笔者认为当于辽阳市南求之。还有肃慎县、归仁县、顺化县,因疏于简略,仅记县名,一时难以考证。

2. 开州

开州 是辽太祖灭渤海后,迁渤海东京龙原府庆州民来辽地建城,并废其所辖龙原等六县。此后圣宗耶律隆绪于开泰三年(公元1014年)征高丽时,“周览城基,复加完葺”,又迁双州、辽州千余民户实其地,初名开封府,后改为开州。考开州,必在通往高丽的交通要道上。《辽史·地理志》开州条下记其附近的情况有:“叠石为城,周围二十里。薛仁贵征高丽,与其大将温沙门战熊山,擒其善射者于石城,即此”。金毓黻等《奉天通志》认为:“叠石为城”是“指渤海龙原故府而言”。笔者认为,《辽史》许多地方是以渤海的地方为辽地,记载有误,唯独此条未必如是。按今凤城县西南5公里凤凰山上有高句丽时期以石块叠筑的山城,即乌骨城,周围二十里有奇,虽然薛仁贵战温沙门是否为此尚须讨论,但其征辽东时未至渤海龙原府地则是明确的。辽人在今凤城县城建开州时,见凤凰山上有城,并知其结构、规模,是无可怀疑的。因此,辽志开州下记载了在州城附近石城概貌与历史事件。据此,在今辽宁地区符合上述条件的,只有存有古城址的今凤城县城。明毕恭《辽东志》卷一《地理志》古迹门载:“开州,辽阳城东三百六十里,即今凤凰山堡”。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载:“凤凰城,(在辽东都指挥使)司东南三百五十里,其相近有凤凰山,山上有叠石古城,可屯十万众”^⑤。《大清一统志》认为:开州故城“即今凤凰城”。所考不误,辽开州,即今辽宁省凤城县驻地凤城镇古城址。开州统州三、县一。

开远县 为开州倚郭县,亦为今凤城县城。

3. 盐州

盐州 为开州支郡,亦为辽灭渤海迁东京龙原府盐州(即龙河郡)民,并废海阳等四县,来辽地建城,户三百。其地距开州一百四十里,但未言方位。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谓:“盐州城,在开州西北。辽志:州去开州百四十里”。李慎儒《辽史地理志考》则谓:“盐州城,在今朝鲜国咸镜道开州城西”。日人白鸟库吉等《满洲历史地理》认为:“《读史方輿纪要》(卷三十八)开州城,在咸兴府(朝鲜咸镜南道)的西北,盐州在开州的西北,与《大清一统志》(卷四二一)的同样说法,俱误”,但未指出应在何地。金毓黻等《奉天通志》认为:“盐州本渤海故州,辽徙置于距开州一百四十里之地,故城所在已不可考。杨氏辽地理